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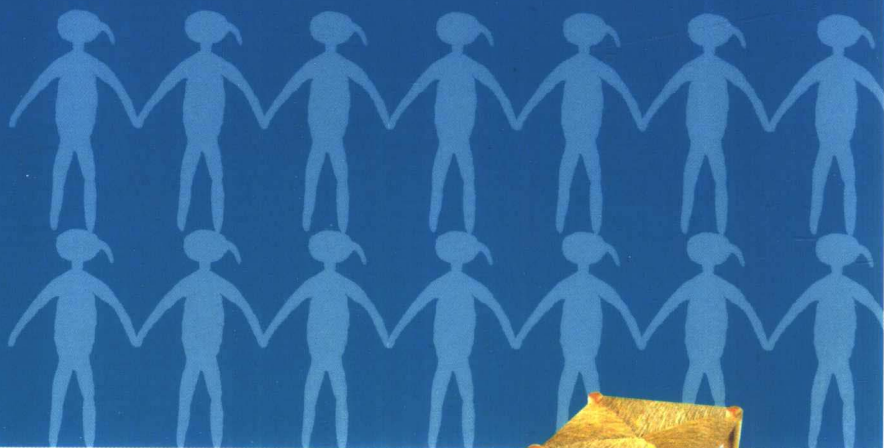
社会学家

Teahouse For Sociologists

主编 张立升 执行主编 王 焱

茶座【精华本·卷一】

304篇文章优中选精，
62位名家指点江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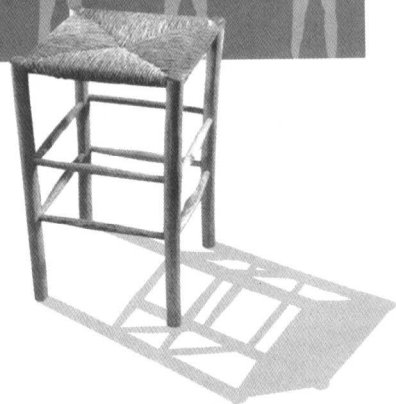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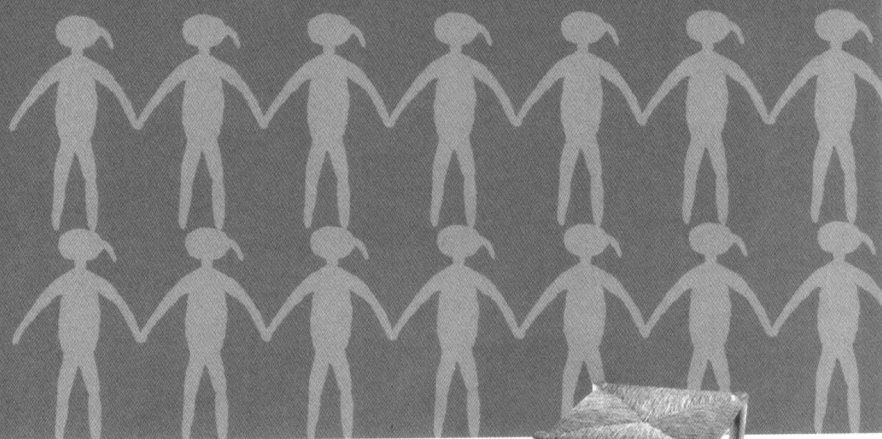
社会学家

Teahouse For Sociologists

主编 张立升 执行主编 王 焱

茶座【精华本·卷一】

304篇文章优中选精，
62位名家指点江山。



山东人民出版社 SHAN DO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社会学家茶座精华本. 卷一/张立升主编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6. 2

ISBN 7-209-03933-3

I. 社... II. 张... III. 社会学-文集 IV. C9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01232 号

社址: 济南市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 250001

网址: <http://www.sd-book.com.cn>

E-mail: whl0501@sohu.com

编辑部电话: (0531) 82098901

发行部电话: (0531) 82098028

印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规格: 730×970 毫米

开本: 16

印张: 26.25

字数: 430 千

版次: 2006 年 2 月第 1 版 200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7-209-03933-3

定价: 28.00 元

壶中别有天地

据说在学术的百兽园中，原来群兽各安其位，井然有序，一头大象来得最晚。它始则小叩门扉，探进鼻子，继则迈开大步，踏破围栏，结果，不但群兽为之震骇，整个学术的情势也幡然改观。而社会学，就是这头迟来的大象。

何物“社会学”，竟敢如此觊觎自傲？由于社会学的包罗万有，无所不在，誉之者固然以大象称美，而贬之者则径呼为“剩余社会科学”。不管怎样，“在当今世界，能够将现时代表征得最透彻的就是社会学”——博雅如曼海姆曾如是说。当此全球社会都处在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动之际，社会理论也正在重新取向与重新建构，因而“茶座”虽小，取的却是“大社会学”的概念，这是希望避免凝固僵化，常葆思想的清新与活力。

对于学院的高头讲章，“茶座”抱持应有的敬意，但据当代社会理论的大家哈贝马斯的研究，他最看重的 secteurs publiques（公共领域）偏偏不在高华庄严的学院讲堂发端，而恰恰诞生在法兰西的“茶座”——那些遍布于巴黎街巷中的大小咖啡馆里。如此说来，讨论社会和社会学而以“茶座”为名，可谓正得其宜。

在笔者看来，社会学不是一门职业，尽管它可以成为一种职业，而是一种视角，一种观人观物观红尘观大千，而且也反观自身的“社会学之眼”。举凡采取这样的视角，篇幅可以长短错落，调门也可疾徐抑扬，文体何妨庄谐杂出，道理尤宜深入浅出，“不出日用常行内”，“思入风云变换中”。不论作者是否以社会学科为业，都是“茶座”的座上之宾。以茶会友，品茗谈天，宇宙之巨，苍蝇之微，富人之乐，穷人之悲，大而四海浪涌，小到杯水微澜，都是社会学，都可汇入学人的茶余闲话。前人说饮茶妙趣，道是“壶中别有天地”。学界时贤新秀，博雅高明，阖兴乎来！

王焱于京中芳古园

2002年8月15日

目 录

| 卷首语 |

- 001 王 焱 壶中别有天地

| 社会经纬 |

- 006 孙立平 断箭——关注当下中国发展中的社会断裂
023 吴忠民 公正的两个基本边界
029 陆学艺 农民工问题要从根本上治理
042 吴忠民 有关农民的三种提法需要正名
048 穆光宗 “三农”问题三问
055 洪大用 应对高风险社会
062 唐 钧 老龄化：祸兮福兮？
067 邵道生 社会转型期腐败泛滥的对策
074 范志海 “内卷化”：一个值得重视的制度创新机制
079 吕守信 血、毒、性三路合一——我国艾滋病病毒传播的主导途径

| 茶烟一缕 |

- 086 于光远 笑话时代

- 091 王元化 大传统与小传统及其他
- 095 叶秀山 我的“金钱”观之变迁
- 101 陈嘉映 以“历史”的名义
- 103 唐晓峰 老北京
- 107 江晓原 “天文和性有什么关系?!”
- 110 许章润 罪者的清白
- 112 李远山 曹操与蔡文姬
- 117 张立升 俯仰之间——等级、意识、感觉及其他

┆ 科学、技术与社会 ┆

- 121 黄国泰 面对“希波克拉底的誓言”
- 125 肖 峰 假若心智可以被数字化增强
- 131 周孝正 关于科学与人文的答问——萨斯引起的思索
- 136 马来平 走出科学双重性的灰色地带

┆ 知识人与现代社会 ┆

- 141 汪丁丁 知识分子行将就木
- 147 葛剑雄 杂说知识分子
- 153 邵 建 知识分子的公共责任与困境
- 159 张黎夫 什么知识分子? 什么知识分子问题?

┆ 众生世相 ┆

- 163 李培林 大陆新娘·女权·三寸金莲——台湾访学随笔
- 168 郑也夫 饭局:一种社会学的分析
- 172 周国平 哲学家或中蛊者——记一个为思想而痛苦的农民
- 179 卢 风 游戏的人
- 184 何怀宏 救助与回报——对一起溺水救人事件的分析

190 田 松 “我民间,但是我科学”

196 钱冠连 野兽在嘲笑

203 贺承军 房地产界三大俗

| 争 鸣 |

206 赵南元 人文关怀,还是“皇帝的新衣”?——从“基因歧视”说起

214 肖显静 科学真的不需要伦理学?——与赵南元教授商榷

| 学术沙龙 |

221 苏国勋 “共生理念”的社会学解读

227 文 军 从理论的“狂欢化”到学术场域的反思

231 渠敬东 社会学是什么?

235 林聚任 社会学怎么了?——关于社会学的科学地位的争论

241 潘天群 “游戏理论”将一统天下?

246 张小军 “反抗”还是“共谋”?——“阿米巴效应”和人类变形虫

| 性与社会 |

251 李银河 同与异问题上的五种立场

256 周华山 女性如厕与身体政治

263 潘绥铭 无法回避的存在——透视“性产业”的存在形式

268 黄盈盈 从身份认同看“三陪小姐”——“红灯区”调查手记

276 郑也夫 有性繁殖与婚配制度

287 陈蓉霞 女人天生是第二性?

| 海客谈瀛 |

292 薛 涌 日本会不会堵住东亚的发展之路?

299 夏 星 娜拉出走以后怎样了?——欧洲兴起男性解放运动

305 夏 星 背后的战争——诺贝尔和平奖的评选及幕后运作

- 311 张 静 社会运动在澳洲
317 李培林 台湾村落走访随笔
325 秦明瑞 大学生大龄化:德国社会和高等教育面临的难题

| 社会史话 |

- 331 王 毅 蛮性的遗留——“文革”时期流行的社会巫术种种
338 王学泰 话说江湖(上中下)
361 余南平 富人的骆驼怎样穿过针孔?
365 王思琦 “侠盗”传奇中的暴力与权力
373 张小军 从王安石变法看官民关系

| 学人述林 |

- 378 丁学良 问学于丹尼尔·贝尔之门——哈佛留学生活断忆
388 林聚任 哈佛社会学
395 周晓虹 芝加哥社会学派
411 林聚任 永远的罗伯特·默顿
415 于 一 社会学家中的一个异数

社会学家茶座精华本(卷一)

主 编 张立升
执行主编 王 焱
助 理 王 萍
责任编辑 王海玲
出版发行 山东人民出版社

Greatest Papers Of Teahouse For Sociologists

Chief - Editor Zhang Li - sheng

Executive - Editor Wang Yan

Shan Do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编者按: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孙立平教授,近年一直关注着当下中国社会发展中一个令人不安的趋势: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社会状况的改善之间出现了断裂。这就警示人们,需要通过不断制订和完善社会政策,弥合这一社会结构中出现的断裂。希望本文能引起理论界与执钩者的关注。

断 箭

——关注当下中国发展中的社会断裂——

孙立平*

90年代的中国社会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不同于80年代

问:对社会进行准确的定位,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无论是一个社会的基本政策取向,还是思想的基调,都往往要以此为基础。您最近一直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您如何看待目前中国社会的定位问题?

孙:在这里,我将主要以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这样一个特定的角度,来讨论目前中国社会的定位问题。当然需要说明的是,对目前中国社会进行定位,远不是这样一个角度所能够完成的。我们将注意力集中于这样一个角度,主要是由于这个角度在以往的讨论中几乎完全被忽略了。

问:为什么要强调“90年代以来”这个概念?

孙:对目前中国社会的定位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而在现实中,我们看到,这种定位往往是以改革为标准进行的,即“改革前”、“改革后”的论证语式。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问题往往被人们忽视了,那就是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所发生的变化,以及90年代中国社会和80年代中国社会的区别。实际上,

* 作者为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自 90 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一些非常重要的、根本性的变化。这些变化有的可以看做是 80 年代的延续,而另外的一些则意味着一些新的重要的变化。正是这些变化使得 90 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已经成为与 80 年代的中国社会非常不同的一个社会。然而遗憾的是,从目前来看,我们的理论界和政府中的政策制定部门对这个问题似乎还缺乏应有的敏感。

问:这种不同最集中地表现在哪些方面?

孙:这种变化,从最表面的层次来说,是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关系在 90 年代和 80 年代相比大大不同了。在 80 年代,一般地说,经济增长会带来社会状况的自然改善。也就是说,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关联度是很高的。这是不难理解的。因为当时改革的起点是经济生活的匮乏和由此导致的社会生活的种种问题。也就是说,当时许多社会层面上的问题是卡在我们的经济实力上,比如,物质生活水平的普遍低下,日用消费品的短缺(特别是生活必需品和住房),公共服务业的不发达(当时是吃饭难、住宿难,甚至还有理发难)。因此,在经济增长的推动之下,整个社会生活的状况迅速改善。从中,人们看到了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一种几乎是齐头并进的图景。

但到了 90 年代,经济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能导致社会状况的自然改善。在前些年经济比较低迷的时候,我就有一个疑问:尽管当时中国经济是低迷的,那是相对于我们自己而言,其实只是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但其增长速度仍然在 7% 左右。如果和其他国家的经济增长情况相比,7% 仍然是一个相当高的速度了。从理论上说,在这样的经济增长速度之下,我们感受到的应该是全方位的繁荣,但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无论是从某些企业的生产和经营的情况来看,还是从部分人的日常生活来看,都呈现出某种不协调。这当中的原因是什么?我曾经向一些经济学家请教过这个问题。有人说,这是因为我们的经济增长数字中有水分。即使把这个因素考虑到,经济学家说,两个百分点的水分也足够了。那就是说,我们的实际经济增长速度仍然有 5%。但即使是 5%,也是一个相当不错的增长速度了。那为什么在 5% 的增长速度之下,有的人感到现实的生活不如从前?这说明,在经济增长的成果和社会成员的生活之间,在经济增长和社会状况的改善之间,出现了断裂。

这一点,在 2000 年表现得尤其具有象征性。2000 年是我国经济初步复苏的一年,我国经济连续几年增长速度下降的趋势得以改变,年经济增长的速度

达到 8%。但在这一年的时间里,社会状况并没有随着经济增长而明显好转。具体表现在:贫富悬殊的状况没有发生明显的改善,就业的状况没有明显的好转,各种社会问题的状况也没有得到明显的缓解。在这当中,我们尤其要关注的是就业的状况。从最近几年的情况看,1997 年我国 GDP 增长了 8.8%,从业人员只增加了 1.1%;1998 年 GDP 增长 7.8%,从业人员只增加了 0.5%;1999 年 GDP 增长 7.1%,从业人员增加 0.89%;2000 年 GDP 增长 8%,从业人员增加 0.79%。

当然,这只是在表层所呈现出来的现象。对于这表面背后的,则需要分析 90 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结构所发生的一系列重要变化。

从生活必需品时代到耐用消费品时代

问:您所说的这些背后的因素,主要是指哪些?

孙:主要指的是导致一些重要变化发生的背景因素。在这些因素中,特别要强调的有两个:一个是从生活必需品时代到耐用消费品时代的转型,另一个就是社会中资源配置从扩散到重新积聚的趋势。这两个变化,极大地改变了我们的社会生活。因此,要谈 90 年代以来中国的变化,就不能不对这两个问题给予高度的关注。

问:那我们先来谈第一个背景,即从生活必需品时代到耐用消费品时代的转型。

孙:好的。我们可以从一个日常生活的现象谈起。在人们议论生计、议论日常生活中的开销的时候,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一种说法:“现在每个月吃饭用不了多少钱。”在这种日常生活中简单判断的背后,实际上是我们这个社会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的变迁——从生活必需品的生产和消费时代到耐用消费品的生产和消费时代的变迁。

这个转变体现在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之中。在 90 年代之前,特别是在 80 年代之前,大多数人的工资都是以几十元计。这几十元的工资,几乎有着非常固定的用途。多少钱用来购买凭粮票供应的粮食,多少钱用来购买凭布票供应的布料和衣服,多少钱用来购买同样是凭票供应的肉、油、蛋、鱼、火柴、麻酱等日用品,几乎都是固定的。购买完这些东西之后,每个月的收入也就所剩

无几了。其中除了商品短缺时期的供给制特征之外,呈现的是一种生活必需品的生产—消费时代的典型图景。在那个时代,整个社会生产的产品,主要是人们生活所必需的日用品。人们的收入主要用来购买这些生活必需品。

但在今天,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新的时代,那就是耐用消费品的生产—消费时代。在这个时代,耐用消费品的生产和消费开始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主要内容,而生活必需品的生产和消费则退居次要的地位。直接反映这种状况的,是恩格尔系数的变化。恩格尔系数是指食品类支出占消费总支出的比重。联合国粮农组织用恩格尔系数作为判定生活发展阶段的一般标准:60%以上为贫困,50%~60%为温饱,40%~50%为小康,40%以下为富裕。我国城镇居民生活的恩格尔系数是在“八五”末期下降到50%以下的,1999年继续下降到41.9%,2000年下降到40%。在2000年,恩格尔系数在农村居民中约为50%。

问:那么从生活必需品时代到耐用消费品时代的转型,对我们整个社会生活,特别是对于社会结构的变化,具有怎样的影响?

孙:应当说,对于这样一个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而且对整个社会生活有重大影响的变化,几乎完全被我们的理论界所忽视了。也许有人会说,在生活必需品阶段,人们为基本的生存需求而奔忙,而到了耐用消费品阶段,满足基本生存需求已经大体不成问题,宽敞的住房、汽车、高档电器、各种服务开始进入人们的生活,这不是很好的事情吗?还有什么要讨论的吗?

在这里,我们首先要指出的一点是,一个社会从生活必需品阶段转向耐用消费品阶段期间,整个经济和社会生活会发生一系列的重大变化,如果不能妥善地处理这个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有可能会酿成某种危机。20世纪30年代的西方经济大萧条,至今还会被人们不断提到,但对于这场历史上罕见的经济大危机的原因所做出的种种解释,却不断受到人们的怀疑和挑战。近些年来有些学者开始认为,这次经济大萧条就是西方世界由生活必需品阶段向耐用消费品阶段的转型所引起的。因此,我们绝不能对这个变化或转型给予丝毫的轻视。其中的具体含义,我们将在下面陆续谈到。

资源配置:从扩散到重新积聚

问:那我们现在再来看另外一个背景性因素,即资源配置从扩散到重新积

聚的趋势。

孙：在 80 年代之前，中国社会的财富主要集中在国家手中，然后由国家依据个人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来进行再分配。与这种制度相伴随的，是社会财富和资源的极度“匮乏”。在这种情况下，从社会边缘开始发端、以市场为基本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无疑会具有一种财富增长和资源扩散的效应。

在这个过程中，首先，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和边缘群体最早在改革中受益，社会中最贫困阶层的收入和生活得到改善。在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同时也是由于国家提高粮食和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农民的收入增加了；城市中职工的收入由于工资和奖金的增加而提高了（有时甚至出现超分配的现象）；同时，一些事实上处于失业状态的人们，如部分无法进入国家机关和国有企业的回城知识青年以及刑满被释放的人员，在改革政策的鼓励下，开展个体经营，这部分本来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们从而成为最早的致富者。在当时的情况下，除了极少数成功的个体户之外，社会中并不存在过于富裕的阶层。可以说，在 80 年代，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是改革的受益者。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了所谓“共同富裕”的局面。

其次，是社会中的边缘地带出现了兴旺的气象和发展的生机。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使得人民公社时期缺少劳动积极性的社员成为自主经营的农民。加之新的政策鼓励农民实行多种经营，农村经济出现了明显的增长。与此同时，由于城乡二元结构仍然存在，农村中不断增多的劳动力和其他资源无法流入到城市中去，而只能以乡镇企业的形式在农村内部积聚起来。尽管这对于整个社会来说有利有弊，但客观的结果是促进了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在 80 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乡镇企业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乡镇企业的发展不仅解决了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而且大大增加了农民的收入。然后是在乡镇企业的推动之下，小城镇迅速发展起来。

再次，随着放权让利式改革的推进，基层政府和企业获得了更多的自主权和可供支配的资源。在经济和社会活动中，基层政府和企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过去那种消极的执行者角色，而成为积极的主体。基层政府和企业掌握资源的增加，为基层经济和社会生活带来了活力。

问：这种趋势是在什么时候开始发生变化的，这种变化又是怎样发生的呢？

孙：在 80 年代，特别是 80 年代中期之前，与财富扩散的趋势唯一不同的现象，是“官倒”的出现。而“官倒”的制度背景，则是价格的“双轨制”。在 80 年代中期，“官倒”现象曾导致一些拥有或接近政治与行政权力的人们成为中国最早的富裕者。但总的来说，这些人数量极为有限，所获得的财富也相当有限，并不足以对整个社会的收入分配格局造成根本性的影响。对于其中的一些人，人们称之为“万元户”。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的有些人，正是靠着从事“官倒”活动中积累起来的财富，完成了最初的原始资本积累过程，甚至成为 90 年代有名的私营企业主。

在 80 年代末期和 90 年代初期，与 80 年代的走向截然相反的财富聚敛过程开始发生。这个过程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市场机制、收入差距迅速拉大、个别官员贪污受贿、国有资产流失，造成收入和财富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尽管城乡之间壁垒森严，但通过税收、储蓄以及其他途径，大量的农村资源源源不断地流向城市社会；在税制改革的推动下，政府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财政收入，然后将这些收入集中投向大城市特别是特大城市；证券市场的发展，企业间的重组和兼并，将越来越多的资金、技术和设备集中到数量越来越少的企业之中。所有这一切，都在从根本上改变着中国的资源配置的格局。

这种资源重新积聚的趋势，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首先，群体间的收入和财富差距越拉越大。在改革初期的“做大蛋糕”的改革模式中，是在失败者出现之前造就了成功者。但在 90 年代，由于资源配置机制的变化，社会中的一些人迅速暴富起来，而原来在改革初期得到一些利益的部分边缘群体和弱势群体日益成为改革代价的承担者。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一个数量不多的“富人”群体开始形成，另一方面，城市中的失业者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群体。这个群体在改革前，无论在经济收入还是在社会地位上，都处于明显的优势位置，但在过去的十几年中，已经沦为城市社会的底层。一些开工不足企业的职工和部分退休职工，也大体属于这个群体。

其次是社会的边缘地带开始凋敝。这特别表现在农村和小城镇中。在一些地方的农村，已经很少能够看到年轻人，有的村庄已经成了“空壳村”，而且道路和水利等基础设施普遍破败失修。在这种现象背后的，是过去的十几年中，农业已经基本成为一个无利可图的产业。在这一段时间里，尽管国民经济以 6%~8% 的速度在增长，但农民的收入基本上是停滞不前。在 1997 年后，尽

管农民收入的平均水平还在以缓慢的速度上升,但实际上,就大多数以农业为主的农民来说,收入实际上是下降的。

再次,近年来财政收入越来越多地集中到上级政府,基层政府的财政能力越来越弱。部分县级政府已没有能力支付公务员和教师的工资。

资源的集中导致底层社会的形成

问:那么这种变化在社会结构层面导致的结果是什么?

孙:90年代资源重新积聚的一个直接结果,是我们的社会中开始形成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弱势群体。弱势群体在任何社会当中都是存在的。在80年代乃至改革前的中国社会中,弱势群体也是存在的(当时主要是指老弱病残人口)。现在我国的弱势群体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下面的原因:第一,在贫富悬殊不断扩大的背景下,这个群体的存在格外引人注目。第二,原来的弱势群体主要在农村,虽然人们也知道有贫困的农民存在,但毕竟离社会的中心较远,在社会的中心那里形不成深刻而具体的印象;而现在作为中心的城市本身就出现了贫困群体,令人们对弱势群体的感受更加直观和具体。第三,在80年代,尽管有弱势群体存在,但他们的生活状况也在朝着好的方向改善;而进入90年代,特别是进入90年代中期之后,在弱势群体中,绝对贫困的现象开始出现。这意味着在我们的社会中,在经济相对迅速增长的同时,有一些人的绝对生活状况在下降。第四,如果拨开平均数字造成的迷雾,人们可以发现,在过去几年的时间里,这个弱势群体的数量不是在减少,而是在上升。正因为如此,在目前我们的社会中,弱势群体问题正在成为一个迫切需要关注的现象。

问:这个弱势群体主要是由哪些部分构成的?

孙: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社会中的弱势群体主要是由如下的几个部分构成的:

第一,以种植业为主的农民。80年代中期农村改革的能量基本释放完毕,90年代中期乡镇企业成为强弩之末,加之粮食等农副产品价格的持续下降,农民的“弱势”特征开始逐渐表露出来。据专家估算,在90年代的最后几年中,粮食的价格下降了30%多。这意味着,对于绝大多数以种植业为主的农民来说,近年来实际收入是下降的。一方面是农民实际收入的下降,另一方面是

城市居民收入的提高,结果就是城乡差距的迅速扩大。1978年中国城乡人均收入之比是2.4:1,到1983年缩小到1.7:1,呈明显缩小的趋势。但到了1997年,又迅速扩大到2.5:1;2000年扩大到2.79:1,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达到历史上的新水平。从占有的金融资产来看,1999年末农户储蓄余额约为10000亿元,不到全国居民储蓄存款余额的1/5,而农民在全国人口中所占的比重将近65%。更重要的是,只要农民被束缚在“乡土”上这一结构性条件不变化,农民问题难以从根本上解决。一个基本的事实是,现在中国农民的收入,与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的收成状况已经几乎没有太直接的关系。最近几年粮食生产基本是丰收或持平,即使是在丰收之年,农民的收入也没有明显的增加。而在中国已经“入世”,且国内大部分农副产品价格远远高于国际市场价格的情况下,依靠大幅度提高农副产品价格来增加农民收入显然是不可能的。

第二,进入城市的农民工。弱势群体的含义不仅仅是经济的,同时也是社会的。农民工就是一个典型的由经济和社会双重因素造就的弱势群体。从90年代初开始,农村中的剩余劳动力涌向城市,到目前为止,已经达到上亿人的规模。从整个社会的角度看,数以亿计的农民工已经成为一个具有相当规模、身份和社会地位相当独特的社会群体。从一个方面来看,农民工进城打工,不仅对于增加农村居民的收入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对于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素质,其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有研究报告表明,农村青年认为进城打工的最大收获是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但在另一个方面,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农民工一开始就是以一种不平等的社会身份进入城市的。对于其中的许多人来说,他们虽然是居住在城市内,工作在城市中,但在制度上他们并不是城市社会的一员。从动态的角度来看,在今天,许多临时的过客似乎开始在这个不属于他们的城市中安顿下来。在一些行业中,比如建筑业,他们已经成了一线工人的主体;那些在这里从事拾遗补缺工作的人,也拉家带口地要在城市中安顿下来。然而,尽管是这样,僵硬的户籍制度仍然将他们排斥在他们所工作和生活的这个城市之外。在这个城市社会中,他们无疑是缺少保障的人。其中的一些人还有过被收容和遣送的经历。在工作场所中,他们的基本权利经常得不到应有的保障。这主要表现在:第一,农民工所从事的都是城里人所不愿从事的工作,工作环境差,待遇低。2000年在广东惠州曾发生过一起一个月工作



500个小时,使得打工仔当场累死的事件。据了解,这家手套厂的工人都长时间地加班,一个月里每个工人的平均工作时间都要超过500小时,但工人的月工资最低的只能拿到300元。第二,基本的人身权利得不到保障。第三,工资经常被拖欠。

第三,城市中下岗失业者为主体的贫困阶层。90年代以来,我国失业下岗的问题日益严重。在城市中,失去职业意味着基本生活来源的断绝。因此,在最近的几年间,我国的城市中已经形成了一个以失业下岗人员为主体的新的贫困阶层。这是原来不曾有过的现象。与农民相比,这个贫困群体具有一些独特之处。第一,农民还有自己的一块土地,即使缺少现金收入,吃饭的问题还可以自己解决;而城市中的居民没有这块土地,当现金性收入断绝的时候,生计就无法维持,在那些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还不能落实的地方,可能连吃饭都成为问题。有关部门1999年对北京市1000名下岗职工的调查显示,职工下岗前后个人收入平均下降61.15%,特困户下降的幅度还要大些。第二,普遍贫困是农民所处的基本环境,在农村中缺少贫富差别的刺激;而在城市中,贫富差别以极为鲜明的状态存在着,不时对城市中的贫困群体产生强烈的刺激。第三,城市中生活费用高,且缺少弹性。在90年代初期和中期,物价和生活费用急剧上升;到了90年代末,虽然物价相对稳定,但增加了一批原来属于社会保障而现在则需要自己负担的消费项目,如住房、子女的教育费用、部分的医疗费用和养老等。由于下岗职工主要集中在35至45岁之间,他们上有老、下有小,其工资收入是家庭生活的主要来源,一旦下岗,全家就会陷入贫困的境地。第四,在单位仍然具有很强福利化特征的情况下,失去工作和收入的同时意味着失去诸多的福利。

社会结构显现出种种断裂的迹象

问:如您所说的,在任何社会中,弱势群体或底层社会都是存在的。那么,这在目前中国社会,特别是在社会结构的含义上,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

孙: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在社会结构的层面上,这种现象是以结构断裂的方式体现出来的。

90年代中期在法国访问的时候,我们曾向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图海纳提出